

昆明之力

文/朱晓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有一座城，每百户有十八辆私家汽车，每个人有住房面积三十平方米。应当告诉读者，这座城在中国的城市中人均收入属于中下等。还有另一座城是中国最富裕省份的首府，平均每百户有十四辆私家车，平均住房面积是将近二十五平方米。

这两座城相比，前一座城像一个沙漠中的城，属于全国最缺水的14座城市之一，建筑物犹如蜂窝密集，城中很少树木，汽车拥堵在几乎每一条街道。说缺水其实是指缺乏符合卫生标准的水，脏水并不少。这座城市边有一个二百多平方公里的湖，湖水是劣五类水质。后一座城市绿树成荫、清澈的湖水和通畅的道路。前一座城的三任规划局长或被判刑或卷着赃款逃之夭夭；后一座城市的市长现在是国家建设部副部长。

前一座城是我的家乡昆明，后一座城是杭州。

有一句时兴的话这样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过去以为中国的城市都像昆明一样的沦陷了。后来到了杭州才幡然猛醒。

前几天在为荷兰学者刘本的演讲作评论时，我又想到上面那句有关“沦陷”的俗语。刘本君的报告是关于滇池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监管问题。他的结论是悲观的。他有一个结论如此：如果说一个地方之守法是被监管者、执法、社会压力以及市场这些原因“汇合”的结果的话，那么在滇池沿岸这些因素都存在，但汇合的结果却是“违法”！虽然每一

个人的故乡都或多或少沦陷了，我想唯有昆明在沦陷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前行。

昆明是一个稀有的受发展主义风潮毒害很深的地方。

滇池的污染已经没有多少好说，已经有无数的人写过和骂过。最近的经典是我的朋友于坚的《哀滇池》。值得提醒读者的是，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懂得世人的眼球都盯住滇池。因此对于治理滇池水的事情看上去都在以认真的态度做着。但是对于一些不为人目光所及的地带，情况完全不同。我这里要说的就是滇池盆地的农地的消失。有谁能告诉我们最近十年这个地区有多少耕地（其中包括一些种植莲藕和养殖的湿地）消失？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昆明的环境？我谷歌了一下，发现1990年昆明城市面积为70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170平方公里。有谁能告诉我们2004年至今又扩大了多少呢？这是个关键问题，因为从那以后昆明的城市扩张主要是在滇池沿岸进行的，即实施新昆明计划。这个新昆明计划虽然没有被国家整体批准，但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已经在实施。

昆明人或多或少会对滇池水的污染表示愤怒。但是却少有人对新昆明计划下，那些使城市得以呼吸的农地和湿地的消失有任何反应。相反，昆明人对于城市在滇池边的扩张有着高昂热情。

昆明城市向来被诟病为患有“跟风”的毛病。这种跟风，说好听点儿是“时尚”，说难听点儿是缺乏文化底蕴。这

样的地方在遭遇发展主义的流行风气时已经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再加上当下的发展主义是以权和钱相合谋，是通过大众媒体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间地理空间为手段的。于是乎，从白天到夜晚，从工作场所到床头，在“精英生活”、“诗意栖居”和“某某卡刷一刷，QQ立刻开回家”的围堵之下，不仅沦陷，而且连沦陷的感觉也没有了。

昆明市民有追逐时尚之风的传统，而那些马克思说的毛孔中都流着血的人趁机利用了这个地方的人性弱点，铺天盖地占领他们的视听空间和时间，使他们生活在一种追风的生活之中。到头来这座风趣之城变成一个发展主义的恶劣标本。

刘本君的滇池研究使我哑然的是上面说到的那样一个多种要素汇合成“违法”的结论。为什么这种违法汇合能出现？我作为一个熟悉那个地区历史的人类学者，不想对此风的来源进行分析，只想从那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拿出一两件说说。它们能让读者懂得这个大风潮中的一滴水珠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看一看昆明地区人人皆知的一个楼盘。它叫“新亚洲体育城”。

这个楼盘在昆明南部、滇池东岸，即新昆明的中心点。新亚洲体育城项目是以建设（今年7月份）将在昆明召开的第七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主场馆为目的而开发的项目。按道理说这应该是一个“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征地开发的项目。为此项目，2200亩农用耕地被

征用。从开发商的售楼宣传品来看，大约只有1200亩的土地是用于建造与运动会有关的设施。其余1000亩土地则是一般的商品房项目。在开发商的楼盘项目介绍上说：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1000亩超大规模，居住人口达四万的高品质住宅群”等等。

这个项目在2005年对农民征地时，每亩补偿费为12万元，同一时期这样的耕地如卖作一般商品房开发项目的征地，补偿费大约每亩在20-30万元之间，今年则可以达到60万元以上。现在新亚洲体育城的商品房售价在每平方米3800元或更高。这里的土地倒没有流着血，而是每一平方米都涌流着巨额的钱。这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低补偿费和商品房差额之间的滚滚利润。

我们应该追问的不仅是这个项目的“公共利益”性质如何体现？而且更应该知道在这个项目坐落的地方，农民及其社区正在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写的一段有关那个地区的文字中有如下段落：

在我长期研究的村庄已经有三分之二被圈占（剩余耕地也即将消失），社区内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这些矛盾在目前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激烈化），一个具有强社区团结传统和治理良好的村庄正在十字路口上，在强势的开发项目的围圈之下，失去社区依托的个体农户只有以竞相建造“柱子”（在每户仅有96平方米楼距仅有8米的地基上建造5层以上，有些高达十层的楼房）来

争取未来的生存空间……

最近在那里进行实地研究后，我可以说当地空前激烈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是与征地有关。在最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不少村庄发生暴力事件。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性”——就业、贫困、教育、环境、治安和卫生等等将在未来，随着这个地区成为城中村后充分释放。这一切都要未来的地方政府去买单。目前使人触目惊心的是农民因无权公平谈判土地征用转让价格，而陷入的生存空间紧缩。更毒化的是那些一向重视耕地的地方已经进入一种疯狂地转耕地为他用的浪潮。如刘本君所言，在实施与保护耕地有关的法律时需要社会责任性（social responsiveness），但在这些地方社会责任性体现的是“一致违法”！在今天能得到村民的选票而当选为村领导者，是那些能够从开发商（以国家出面）的虎口之中抢回几嘴血肉的人。抢回来的土地当然不能留作耕地再用。一切都得快！分分钟出炉！要赶紧想办法转为自用的非农用地，不然这土地明天就“为了公共利益”而被征收了！一切都得快！要赶紧将老房子“抖”（拆）掉，盖上至少五层以上的楼，将来的生计就指望出租它了！将来城中村改造拆迁的时候能多量得几十平米的补偿！一座楼房在盖建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拆迁能多量得几堆砖头，这是一个什么生活世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昆明人的追风生活背后的无奈和惶恐。

据前两天报载，中国的耕地已经减少到18.27亿亩。18亿亩是十一五规划的底线，十一五刚开始就已经快完成任务了。我想昆明滇池地区的城市扩张对这个数据做出了统计性贡献。

刘本君的报告指出，仅靠执法和守法的司法之道救不了昆明滇池。他指出国外的经验也表明：一些时候需要一种“大立法”——政治和权力一的介入。这实际上说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此刻忽发奇想的是：这里需要来自国家的紧急制动：宣布昆明为一个灾区，然后启动国家救灾的机制。至少这是一个发展主义下的灾区。这使我想到了卡缪的《鼠疫》。

最后想说的是：今天的杭州人坐在西湖边的茶楼上大致还能看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景色。一个昆明人站在大观楼上根本看不到什么“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更不知“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所指何处，还以为这是古人胡说呢。

（转载自学术中华网站）